

## 阿拉伯剧变与中东威权政治的转型\*

### ——历史长时段视角下阿拉伯剧变若干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王 泰\*\*

摘 要: 阿拉伯剧变既是中东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矛盾长期积累后的爆发,也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调整的大背景下,中东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所致根本缺陷的必然反映。剧变既体现出无组织、新媒体、青年化、多样性等偶然性特征,也兼具中东威权政治转型过程中长期性与艰巨性特点。从剧变的本质及中东政治转型的历史沿革考察,此次剧变应视为阿拉伯世界的一场民主革命。此外,剧变所衍生出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统治的稳定性问题、“土耳其”模式是否适用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转型问题以及由此美国的中东战略调整等问题,是其具有地缘政治意义与影响的外溢性效应。对于阿拉伯剧变所产生的乱局及其未来发展前景,我们必须综合考虑中东政治转型中的历史、宗教、文化与现实等多重因素,用大历史眼光审视国家与社会、军队与政治、民生与民主等关系问题,探究中东国家走向政治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理性之路。

关键词 阿拉伯剧变 中东政治 威权政治转型 民主化

“一只蝴蝶,轻轻离开一朵鲜花,抖动翅膀,在浩瀚的亚马逊河谷翩翩起舞,其渺小的踪迹很容易被斑驳的阳光及细碎的水影所隐没。但是,由

---

\* 本文为笔者参与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中东现代威权政治与民主化问题研究”最终成果的一部分,也是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以来埃及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历史考察”(批准号13BSS004)以及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项目号10&ZD115)(埃及卷)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2012年度内蒙古高校“青年科技英才计划(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建设项目的支持。

\*\* 王泰,博士,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教授。

于某种五官难以感知的声波共振，这殊难察觉的蝶舞居然在几周后唤醒一股巨大的张力，推动洋流排山倒海直击数千里之外的大西洋彼岸……2010 年 12 月 17 日，突尼斯失业大学生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绝望中引火焚身，不治而亡。他以反叛教义的极端方式，为生存和尊严自戕抗争，旋即在突尼斯、埃及、北非、西亚乃至整个中东诱发翻天覆地的社会与政治海啸：29 天，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弃国出逃；18 天，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迫辞职；也门总统萨利赫在示威者和兵变部队夹击下几近下台；巴林、沙特、约旦、阿曼陆续出现罕见的抗议风潮；一向控制很严的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面对拼死抗争，不得不相继取消紧急状态法。最让人惊愕的是，这场海啸居然催生利比亚空前内乱和西方主导的又一场地区局部战争！”

2011 年，突如其来的阿拉伯剧变刚刚爆发，著名中东问题专家马晓霖以一种近乎散文式的笔调，用气象学上的“蝴蝶效应”就此做出上述描述。2014 年，局势动荡进入第四个年头，一波三折的过渡与重建，触目惊心的冲突与对抗，无数生命在剧变中消逝。这一场由中东“旧制度”到“大革命”的剧变把我们对于威权主义政治的拆解——不同的历史背景、相同的政治文化、多种类型的统治模式、不可持续的政治继承、最为低效的政治参与以及美国式“双重标准”的促进民主计划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似乎预示着某种威权统治难以逃脱的历史宿命。目前，转型仍在继续，只不过结局（或者还远远不到说结局的时候）根本不同，有的已经开始向民主化的制度建构稳步前进，有的则出现了向传统的军队威权式统治“回潮倒水”的可能，也有的仍然在进行一场暂时看不到结局和终点的民族战争。绝大多数国家政治动荡、经济滑坡、社会分裂。总之，没有这一场剧变，似乎对于中东威权政治与民主化问题的研究，无论如何都不会完美。

## 一 阿拉伯剧变发生的原因与特征

从剧变发生的原因来看，它既是转型过程中中东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矛盾问题长期积累、综合发酵所致，也是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背景下，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新世纪后遭遇第一次全球性发展危机的一个必然结果，它客观上宣告了西方推行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中东的破产。

1. 剧变是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地中海南岸影响的具体体现，也宣告了西方推动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在中东的破产

21 世纪初，随着“9·11”事件以及美国接连发动对阿富汗、伊拉克战争，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世界格局进入大发展、大变动、大调整时期，这对世界、中东以及中国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2013 年 3 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观俄罗斯国防部时指出，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潮流，但国际格局深入调整，世界仍然不平等、不平衡、不平静，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交织，一些地区局势动荡持续蔓延。<sup>①</sup> 笔者认为，这三个“不”非常恰当地概括出当前国际格局变动的不确定性特点。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指出，当前世界格局变动进入新的不确定期，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 2008 年以来陷入整体性发展危机，但仍存在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我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指出，当前西方资本主义主要面临着经济发展“失调”、政治体制“失灵”、社会融合机制“失效”、思想道德“失范”等四大困境。一方面，危机和困境确实对西方造成较大打击；另一方面，西方仍具备较强实力，生产力还有进一步释放的空间。面对危机，西方国家也在进行反思，并抓紧调整和改革。<sup>②</sup> 第二，发展中国家呈现群体性崛起之势，但可持续发展之路受到诸多限制和挑战。一方面，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金砖国家”一枝独秀，经济增长强劲，对国际经济格局重塑造成冲击；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因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各种矛盾上升，进入高危的社会转型期。第三，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一方面，美国在安全格局中强势依然，特别是其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和“东亚战略再平衡”；另一方面，亚太各国不同程度地进入了以中国经济为中心的运行轨道。亚太各国的外交政策出现双轨导向：在安全问题上以美国马首是瞻；在经济发展上以中国为政策标杆。各国普遍“两面下注”，增加了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第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与以美国为首的安全同盟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缺乏制度安排，由此导致“安全悖论”的局面。一方面，中印等新兴大国为确保其安全利益，迅速发展军力；另一方面，美国及其安全同盟

① 《习近平参观俄罗斯国防部》，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4/c\\_124495586\\_2.htm](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4/c_124495586_2.htm)。

② 刘晓明《对西方资本主义困境的观察与思考》，《人民日报》2013 年 4 月 12 日。

竭力保持军事优势,视新兴大国的军事发展为潜在威胁。其结果是:国际安全环境呈现出恶化趋势。<sup>①</sup>

在国际格局变动的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全球性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矛盾。首先,由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滑坡,大大抑制了全球的石油需求。国际油价一路狂跌,这对依赖石油出口的埃及、利比亚等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打击。其次,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欧美失业群体扩大,直接导致出境旅游者的减少。首当其冲的就是以旅游或侨汇为支柱性产业的中东国家,如埃及、土耳其、突尼斯、摩洛哥、约旦、黎巴嫩等。由于石油和旅游两大支柱经济同时受到打击,这些国家曾经引以为傲的经济自由化迅速转化为一场噩梦,国家财政收支的减少更是直接削弱了其应对危机的能力。最后,最重要的且几乎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国际信贷危机所带来的商品价格,尤其是食品和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对长期依赖食品进口的中东国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严重影响民众的生活。生活必需品价格的飞涨,引起了此起彼伏的民众抗议,而这些国家的政府,既无法在经济体制内抑制市场炒作,也没有财力补助民众,听任民众生活受影响。在贫困、饥饿、失业的多重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中东民众怀着愤懑之情,加入了街头抗议的队伍。而集结的人群,使得相互之间的情绪感染急速完成。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原本潜伏的朦胧的“相对剥夺感”很快浮出水面并逐渐清晰,很容易地把其中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专制体制与政府的贪污腐败。于是,要求推翻政权,建立新体制的愿望被统一起来了。<sup>②</sup>

从中东内部来看,中东特别是阿拉伯国家深受新自由主义之害,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陷入发展困境。地区大国埃及就是典型之一。冷战结束标志着全球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突出特征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全球化的扩散。为了免除多达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债务,从 1991 年开始,埃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专家的建议下开始进行结构改革。<sup>③</sup>金融自由化、私有化、解除管制、开放市场、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国民待遇等一系列结构调整计划在埃及得到执行。但是新自由主义给埃及带来的不只是经济调整,

① 黄靖 《战略大视野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联合早报》2013 年 4 月 15 日。

② 陈敏华 《集群式革命之“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 年第 3 期。

③ 详见王泰 《埃及经济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的历史考量》,《西亚非洲》2008 年第 5 期。

而且是裙带资本主义的盛行、社会日益的两极分化以及大多数埃及人丧失了基本医疗卫生和教育的机会。对此，加拿大学者马耀邦不无讽刺地提到，“作为一个极为贫困的国家，在实施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经济改革数年后，埃及竟被标榜为新自由主义的典范之一”，“正是在新自由主义及其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金融投机商将谷物价格抬高至一种天价，从而导致大规模暴动。……由于城市中心区得到大量投资，而农村的农业发展遭遇忽视，埃及等许多国家很快沦为粮食极度匮乏的国家。更糟糕的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经济改革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第三世界的农民遭受西方国家得到补贴的农产品的不公平竞争，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和粮食危机”。<sup>①</sup>因此，随着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台，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开始信誉扫地。对于那些信奉新自由主义的领导人和拥护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这应当是一记警钟。

总之，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如果说给地中海北岸国家带来了主权债务危机，导致像希腊这样的国家的政府由于面临财政危机而濒临破产，那么它给南岸国家带来的却是由于经济低迷而诱发的粮食危机，并由此“突变”为一场威权主义统治的整体合法性危机。

## 2. 剧变是阿拉伯世界内部政治社会多种矛盾的总爆发

尽管事件来得突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毫无疑问，政治改革不彻底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宪政的角度讲，上述这些国家均为实行议会制总统制的共和国。但是，由于相似的国情和历史经验，它们虽然建立了宪政，执行的却是一党执政，甚至国家总统多年来由同一位政治强人把持，宪法规定的有关议会、政党乃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无法得以实现和保证。

突尼斯制宪议会早在1959年6月就通过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规定突尼斯是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实行共和制政体；1975年3月，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宣布布尔吉巴为共和国终身总统；1988年7月，通过宪法修正案，删改“终身总统”等8项条款，增加了“竞选议员年龄”，“总统职位空缺时由议长担任临时总统职务”等内容；1998年10月通过修改宪法和选举法，降低总统候选人的参选年龄，扩大参选范围，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两届。在这一宪法的框架下，从1989年4月本·阿里当选总统到阿里政府被推翻，阿里已经连任4届，统治达23年之久。也门情况类似，1989年

<sup>①</sup> (加) 马耀邦 《中东剧变与美国、新自由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

11 月 30 日,原北方、南方领导人萨利赫和比德在亚丁签署了统一宪法草案;1990 年 5 月 21 日,双方议会通过了该草案;1991 年 5 月,全国就统一宪法举行公民投票,98.3% 的选民赞成统一宪法;2001 年 2 月,也门举行全民公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总统的任期由 5 年延至 7 年,并赋予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在 1978 年就当选北也门总统,1990 年南、北也门统一,萨利赫出任总统委员会主席。1994 年 9 月议会通过宪法修改案,取消总统委员会,改为总统制,同年 10 月,萨利赫当选总统,1999 年、2006 年连任至今。利比亚 1969 年革命成功后,当年 12 月曾颁布临时宪法。1973 年,卡扎菲发动“文化革命”,宣布停止执行一切现行法律。1977 年 3 月发表的《人民权力宣言》规定:《古兰经》为利比亚的社会法典;人民直接行使权力是民众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保卫国家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利比亚信奉自由、社会主义和阿拉伯统一等原则;革命领导人是全国的最高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目前卡扎菲已经连续执政 42 年。<sup>①</sup>

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在“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认为中东之所以出现伊斯兰极端主义,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体制的专制、独裁,因而要求对中东各国(包括其盟国)进行根本的民主化改革。2005 年初,先是尚未建国的巴勒斯坦举行了阿拉法特去世后民族权力机构主席的首次大选,然后是伊拉克人不顾恐怖威胁及谋杀的危险勇敢地走向投票站,参加了自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之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2005 年 2 月初,沙特也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市政选举。2 月中旬,黎巴嫩举行了要求“主权”“独立”的街头运动,导致亲叙利亚政府倒台并最终成功地将叙利亚驻军赶出黎巴嫩。一时间,西方政界和媒体惊呼“中东民主浪潮兴起”,“阿拉伯的春天”已经到来。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称赞说,在美国和英国的推动下,中东出现的“变革的涟漪”为这片愚昧的穆斯林土地带来了民主<sup>②</sup>。这种背景下,包括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也门等在内的中东威权政府发现自己面临着严峻的民主挑战和变革困境。一方面,在世界民主化浪潮和国内反对派持续不断的巨大压力下,他们不得不进行一定程度的

<sup>①</sup> 据新华社综合资料。

<sup>②</sup> 英国《卫报》,2005 年 3 月 10 日。

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以减轻民主化压力，满足反对派要求；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国内政治、经济等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又使得他们不愿或者不能彻底去改革宪政。突尼斯早在 1994 年就产生独立以来首届多党议会（当然执政的宪政民主联盟占压倒性多数）。1999 年 10 月，又举行了独立后首次多党参加的总统选举。不过紧接着又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在 2002 年 5 月举行的独立后首次全民公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竟然取消了对总统连任次数的限制，并将总统候选人的年龄上限增至 75 岁，继续为阿里执政连任造势。2005 年 7 月，突尼斯举行首次参议员选举，成立参议院。2006 年，本·阿里在保持宪政民主联盟执政地位的基础上推进有控制的多党民主进程，引导反对党参政、议政，逐步扩大新闻自由，减轻西方国家在民主、人权方面的压力。<sup>①</sup> 利比亚情况略有不同，经过多年被国际社会孤立，利比亚政治发生了较大变化，最为明显的就是卡扎菲摘掉了美国所谓“流氓国家”的帽子而重返国际社会。他开始推行有利于利比亚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改革政策，甚至把国名中的“民众”（Jamahiriya）解释为“大众资本主义”，受到了西方的普遍欢迎。但是他仍然拒绝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坚称利比亚的“民众国制度”是世界上最为民主和发达的制度，是其他民主体制应该效仿的榜样，而选举则是退步，因为利比亚人民现在正掌握着权力。

总的来讲，近年来在中东威权的共和国内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政府在民主化改革方面小推小改、不推不改，甚至倒退。每当遭遇较大的压力时，就不惜出动安全部队进行限制，依然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军事控制来维护政局稳定。

正是由于对政治改革不再抱有希望，经济改革又接连遭遇失败，各国反对派活动开始迅速发展。据统计，仅 2007 年上半年，埃及的群众性抗议和示威活动就发生了 283 次；2008 年同期，达到 600 次。尽管这些活动被称为“没有组织性并且大部分与政治势力无关”，主要是民众为了表达对经济政策失败的不满。但它呈现出以下两个明显的不同以往抗议活动的特征：第一，无组织性由此导致的混乱性，在个别情况下出现暴力倾向；第二，因为没有组织者，政府也就缺乏相应的对话者。令人遗憾的

---

<sup>①</sup> <http://baike.baidu.com/view/19505.htm>.

是，政府对这些抗议活动仍旧采取了传统的处理方式，出动警察进行镇压。一旦怨恨的持续集聚以某种民变的形式爆发，政权再采取妥协、拖延则为时已晚。其实，早就有个别西方学者指出，如果埃及政府不能继续向前推动改革，国家很可能会发生类似伊朗的革命或者“起义”<sup>①</sup>；还有的学者借用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概念暗示，如果埃及的政治统治精英不能兑现其对于埃及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承诺，那么埃及政府就很有可能会被国内的伊斯兰势力所推翻<sup>②</sup>。预言的可怕恰恰在于它逼近事实，2011 年春天发生的事情再一次验证了中东作为“世界政治的流沙”绝非言过其实。

3. 阿拉伯剧变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也体现出传统意义上革命的共性特征——艰巨性、复杂性

前者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事件性”的，具有偶然性和时代性；另一类是“结构性”的，具有必然性，表现为阿拉伯世界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政治文化上的伊斯兰性。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预示着未来趋势发展面临多重的选择性和不确定性。

首先，剧变体现出的“事件性”（偶然性）特征主要包括：无组织特征、新媒体特征、青年人特征、多样化特征。刘中民在《阿拉伯国家剧变的共性与差异》一文中指出，剧变具有缺乏独立领导阶层和政治理念的草根性特征。抗议浪潮的主体为中下层民众，缺乏独立的政治理念和统一的组织、宗旨、口号、纲领及目标。这也恰如评论所言“阿拉伯革命的主要谜团之一是它的理念”，“革命没有在任何情况下推出统一的政治口号。暴动者一致提出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更换年迈的领袖。在其余问题上则没有志同道合的迹象。”

以青年为主体力量，具有政治不成熟的特点。在阿拉伯抗议浪潮中，占阿拉伯世界人口 60% 的青年构成了变革的“推动力量”，但也存在着政治不成熟、缺乏领导能力的弊端。“‘谷歌’青年仍处在一种政治无知状态。

① 例如美国学者 Barry Rubin 在其《埃及政治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Islamic Fundamentalism in Egyptian Politics* , updated edition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2002. ) 新修订版中就提出这样的疑问。

② Okbazghi Yohannes , *Politics Economy of an Authoritarian Modern State and Religious Nationalism in Egypt* , Lampeter: The Edwin Mellen Press , 2001.



阿拉伯年轻人对阿拉伯起义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普遍不受信任。……他们几乎没有准备建立政党和自己承担责任。”

网络、手机等新型媒体发挥了重要辅助作用。在阿拉伯抗议浪潮中，网络、手机、微博等新型媒体在信息传递、社会动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媒体指出，这类革命只有在拥有互联网的情况下才变得有可能，因为互联网能够迅速使民众集结起来。“不过，新媒体的作用相对于阿拉伯国家长期累积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而言，仅仅发挥了辅助作用，而非决定性因素。”

抗议浪潮在不同国家引发政治危机的程度及形式不同。具体而言，可以根据其烈度和影响因素的不同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民众和平示威为主的政治与社会动荡。在突尼斯和埃及，虽然抗议浪潮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动荡，但由于“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相对成熟，其较强的民族凝聚力能够保障其国家不致在政治变革中走向内战或分裂”。第二种是民众抗议向部落冲突演变，直至发生内战并引发国际干预的局部战争。在利比亚，盘根错节的部族矛盾和教派矛盾导致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力异常脆弱，并极易在政治变革中滑向部族和教派冲突，甚至走向内战。当前叙利亚的形势也具有这种特点。第三种是民众抗议与教派冲突相交织，并渗透着外部势力的复杂较量。巴林民众抗议的主体力量是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其目标是推翻逊尼派政权，但其背后则是沙特与伊朗的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较量。而美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所采取的双重标准也默认了沙特主导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对巴林的干预。<sup>①</sup>

其次，中东威权政治的转型具有长期性特点，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关键的问题在于自由化与社会化的培育程度。应该承认，剧变本身就是长期以来自由化、多元主义以及社会化的结果。中东威权政治的转型具有艰巨性特点，会有多种可能的结果，民主化只是其中的一个选项，而重新回到威权统治也将是选项之一，下文还要提到。在这个意义上，从“阿拉伯之春”到所谓的“阿拉伯之秋”有其历史的逻辑。中东威权政治的转型具有复杂性特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会深深打上伊斯兰的烙印，这是由中东政治发展的内在结构（体系、文化、功能）所决定的，

<sup>①</sup> 刘中民 《关于中东变局的若干基本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2期。

解决存在于威权与民主之间的矛盾必然要面对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冲突。笔者曾就埃及的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治的关系提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分野(即所谓的左、中、右派)不同,在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中东国家不仅有着一般政治学意义上的激进与保守之分、威权与民主之别,而且还带有浓厚的宗教学意义上的世俗与神权之争。它不仅面临着要不要“发展”和“民主化”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怎么”去发展和实现民主化的问题。这是中东国家国内多种政治力量在长期交往博弈中形成的特点,也预示了它们在实现民主化的任务方面远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加复杂而艰巨<sup>①</sup>。

## 二 剧变是阿拉伯世界的一场民主革命

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进程来考察,本次剧变是中东和阿拉伯世界发展道路继 19 世纪到 20 世纪中期世俗的民族主义、20 世纪下半期各国发展主义到伊斯兰主义之后以民主和民生为诉求的第三次转型<sup>②</sup>。近现代以来,伴随中东从传统威权主义到新威权主义演进的历史轨迹,中东发展道路的追寻与选择已经经历了两次艰难的转型。对此我们不妨结合中东社会政治思潮的演进做一详细的考察。

1. 第一次转型是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阿拉伯社会主义,以坚持世俗化取向为特征的民族主义为重点,威权主义政权在这一时期获得合法性而普遍建立

从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中期,是中东民族主义觉醒和民族国家体系构建的关键时期。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言,民族主义思潮作为“东方国家和地区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主要倾向,它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东方社会、经济、

<sup>①</sup> 王泰 《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治》,《世界历史》2011 年第 6 期。

<sup>②</sup>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郭宪纲认为,本次剧变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世俗救国思潮和改造社会的实践遭受重大挫折和失败。与此同时,作为中东地区另一支重要力量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在这场动荡中或冲锋陷阵,或居于幕后推波助澜,或静观其变,待机而动。不过,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合乎当代潮流,某些组织从事恐怖活动,形象不佳,难以乘势而为。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阿拉伯世界何去何从,是移植西方民主政体还是另辟蹊径,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重大历史抉择。郭宪纲 《阿拉伯世界第三条道路的选择》,《国际问题研究》2011 年第 5 期。

政治和文化的相互关系。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更多地从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领域反映了东方社会的独特面貌”<sup>①</sup>。揭橥中东民族主义的思想家就是被称为伊斯兰改革主义先驱的阿富汗尼。目睹英军在印度的种种暴行，面对伊斯兰世界被西方殖民主义分裂和撕碎的现实，游走于亚欧非三大洲的思想者阿富汗尼率先祭出“伊斯兰改革主义”的大旗，振臂高呼穆斯林的团结，并且他并不拒绝西方文明的某些部分，不仅以其“宗教民族主义”<sup>②</sup>的主张彪炳于史册，而且也成为事实上的最早探索和思考“伊斯兰发展模式”<sup>③</sup>的先知先觉者。无独有偶，同样是阿富汗的马赫茂德·塔尔齐，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东民族主义的杰出代表，其思想主张和实践，不仅反映了阿富汗的民族自觉，而且通过《光明新闻》也代表了同时代土耳其、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是一个真正不可能被遗忘的所谓“被遗忘了的民族主义者”<sup>④</sup>。

大约在同一时期，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横空出世，这就是影响一直延续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前有著名的埃及民族主义思想家，以“伊斯兰民族主义”为特征的拉希德·里达和被誉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第一位理论家”<sup>⑤</sup>的阿布德·拉赫曼·卡瓦克比。接踵而至的是阿佐利和沙乌卡特、拉巴斯、阿拉伊利等，他们最杰出的贡献在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使作为完整的意识形态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最终形成，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在把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关系分开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民族的关系，一种非伊斯兰的世俗化的民族主义倾向初露端倪。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终于走向高潮，其杰出的代表即“革命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米歇尔·阿弗拉克、“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精神之父”萨提·胡斯里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埃及总统纳赛尔。阿拉伯民族主义经过半个多世纪抽象的原则在他们那里终于实现了理论化、现代化、体系化，并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他们不仅坚持了民族主义的世俗化原则，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把社会主义引入民族

① 彭树智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卷首叙意”第3页。

② 彭树智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第240页。

③ 彭树智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第248页。

④ 彭树智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第160页。

⑤ 彭树智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第252页。

主义,体现了在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他们对于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道路做出的深层思考。

在土耳其,泛奥斯曼主义消沉之后,以凯末尔名字命名的“凯末尔主义”是“在东方出现的又一个自成体系的民族主义理论”<sup>①</sup>。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考察,以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革命主义、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为核心的六项原则,不仅显示了反对帝国主义、大奥斯曼主义和强化土耳其人的民族自豪感的智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浓厚的“民主主义的内容”,并彰显了土耳其人的创新精神,对于以君主政治和传统威权为支柱而构建的中东意识形态来说,不啻是政治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十月革命的炮响把马克思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随着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及其影响,共产主义开始向全世界传播,推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走向新高潮。当时主要作为英法殖民统治地区的中东同样受到了这股革命浪潮的冲击和影响,但社会主义在中东的早期命运并不乐观<sup>②</sup>。严格意义上来讲,20世纪中东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属于民族主义的范畴。如果说,20世纪中期之前的民族主义思潮作为中东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指导和理论,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精神引领的作用;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构建,具有浓厚地区特色或者所谓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则意味着阿拉伯国家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历史选择。1947年4月,以阿弗拉克为党主席的叙利亚阿拉伯复兴党成立,正式提出了“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的主张,从此,社会主义在实践上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在中东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西亚,“复兴社会主义在塑造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政治、区域经济和民族文化格局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sup>③</sup>。在北非,1952年7月革命后不久,纳赛尔提出“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的口号,1961年后宣布在埃及全面实施社会主义。由于埃及的特殊地位以及纳赛尔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中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君主政治的言行,纳赛尔主义成为地区影响最大的政治社会思潮,其发展模式也成为各

① 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第213页。

② 详见王泰《十月革命在中东的历史回响——〈金字塔报〉所见的共产主义在埃及的早期传播及其历史命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③ 王铁铮主编《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第99页。

国竞相效仿的榜样，苏丹、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索马里等国家先后宣布奉行社会主义。

不管“自由”“统一”“社会主义”如何排序或者其地位与作用如何（例如，社会主义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事实上，或许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三大任务对于阿拉伯人来讲一个也没有实现。其一，标榜“自由”的纳赛尔政府以及后来的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和老巴沙尔领导下的叙利亚都是典型的“独裁的集权主义政府”，他们创造性地完成了由老威权主义政治文化向新威权主义政治文化的转化，并使之一直延续至21世纪初。其二，不要说“统一”，就是阿拉伯的“团结”都大成问题。中世纪著名的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赫尔蒙（1332~1406）所总结的社会“团体精神”的缺失在当今成为阿拉伯民族的致命弱点。除了在十月战争时期，阿拉伯世界曾经动用石油武器、团结一致共同行动反对美国、荷兰，此后此种“齐步走”的决心和行动就风光不再；无论在对待埃以和谈、伊拉克侵略占领科威特以及海湾战争的问题上，还是从地区峰会上领导人公开的争吵到今天对待阿拉伯剧变的种种不同态度，阿拉伯世界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分裂的印象。其三，说到“社会主义”，五六十年代由轰轰烈烈的埃及“国有化”运动和土地改革掀起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就随着阿拉伯政治彗星纳赛尔的陨落而成为明日黄花。

## 2. 第二次转型是从形形色色的发展主义到伊斯兰（复兴）主义的转变

20世纪70年代以后，“到底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样的问题，即使在社会主义的激情消退之后，依然是中东各国发展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对内，总是要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亟待提高，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无比艰巨而复杂；对外，总是要交往，但大国的争夺愈演愈烈，主导权很少能掌握在中东人民自己手中。面对内外多重矛盾的对抗与纠结，中东国家纷纷开始探索自己富有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于是各种各样的发展“主义”话语应运而生。<sup>①</sup>但是，也必须看到，中东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特殊地位，还表现在它独特的历史、文化方面，尤其是宗教的影响与作用。而发展道路的选择从来就难以回避宗教文化的规定性。客观地说，以第三次中东战争失利和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为标志，阿拉伯世界的发展主义普遍遭遇失败，

<sup>①</sup> 王铁铮主编《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第9页。

而具有浓厚宗教特点的大众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威权主义开始遭遇质疑和挑战，许多国家出现自由化、民主化迹象。

这些威权主义的“发展主义”在理论形态上既不同于之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也不同于继起的伊斯兰复兴主义大潮，大多是着眼于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发展以及发展中如何对待伊斯兰教的问题。体现了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中东文明内外交往过程中，中东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对其国家发展战略的探索和文化立场的坚守。20 世纪下半期，作为中东最早建立共和制并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如前所述，在其立国的基因内部还潜藏着民主化因素），土耳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困惑——先是接二连三的军人干政，然后是宗教政党的异军突起。然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土耳其在经济上的成功和社会的稳定证明了伊斯兰在抵制极端主义、维护政府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2002 年以来，纯粹的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单独执政，并且取得了经济建设、国家发展非常骄人的成绩，也似乎在暗示中东其他国家，只要坚持民主的道路，伊斯兰完全可能引领国家走出发展的误区和陷阱。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治下的埃及给我们展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境况，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从萨达特启动有限的多元主义政治改革，到穆巴拉克时期在经济模式上选择“华盛顿共识”，埃及完全是在美国支持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经济调整，高调走向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与此同时，巨大的社会不公和政治腐败随之而来。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给埃及带来的与其说还有一定的成绩，倒不如说埋藏下了巨大的隐患。

20 世纪，哈桑·班纳的现代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在他的祖国埃及由于穆斯林兄弟会遭到世俗政权的打压而未能实践，但在埃及的邻国——苏丹，哈桑·图拉比却有机会进行这样一场“伊斯兰实验”，不过也是一场短暂的实验。苏丹的经济政治和南北现状最终使他由一个宗教的理想主义者蜕变成一个宗教的空想主义者。与土耳其比起来，恰好相反，这场“伊斯兰实验”的失败告诉我们决定社会发展走向的，最终是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而不是某种思潮。

1997 ~ 2004 年担任伊朗总统的哈塔米，坚信伊朗可以建立具有伊朗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民主政治。他对内支持在伊朗建立公民社会的主张，在具

有浓厚威权主义政治文化的中东可谓石破天惊之举，因为对于严格控制的威权政府来说，公民社会常常意味着民主化在大众和社会层面的实现；而对外他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在彰显了伊朗作为中东大国对什叶派伊斯兰文明充满自信的同时，也隐含着伊朗应该有学习其他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先进部分的历史自觉。以他名字命名的“哈塔米主义”或许不仅是伊朗改革派的旗帜，“在全球呼唤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也代表着伊朗未来的发展方向。

与以上各种思潮具有强烈的个人性特征不同，后犹太复国主义是由一批以色列的号称“新史学派”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对犹太复国主义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犹太复国主义曾经作为犹太人建国的理论和思想，本质上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潮；令人遗憾的是在以色列建国之后，它逐步演化成为压迫、欺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工具，异化成为某种具有种族主义特征的大以色列主义。这些新史学派的历史学家依据新的可靠的档案资料对“以色列的国家性质和发展朝向”<sup>①</sup>等问题提出了批判性看法，在关于以色列的历史阐释、舆论宣传和国民教育、以阿关系、以美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无疑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观点，但也唯其如此，它才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解构。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敏感多事的中东地区乃至整个幅员广阔的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带有群众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大思潮之一。目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已遍布全球，在中东比较著名的组织有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等。他们纷纷以复兴伊斯兰为旗帜，要求回到《古兰经》和《圣训》的原始教义上去，按照伊斯兰教法行事，重新建立一个政教合一，严格按照伊斯兰传统价值标准的社会，其来势凶猛，行为激烈，在整个世界政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代伊斯兰复兴思潮独特而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意义还在于它是伊斯兰社会传统中自发产生并构建的一道抵御西方强势政治、文化冲击的防波堤，

<sup>①</sup> 王铁铮主编《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人民出版社，第293页。

只是这道防波堤表现出来的不是被动消极防御而是主动积极出击。从时间上来说,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与经济全球化的扩张有着内在深刻的一致性,而不是偶然的重合;从形式上来说,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以民族化、本土化对抗西方化、美国化(当然全球化不是西方化,更非美国化,但在中东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如此)。

打着伊斯兰的旗号,实质上与伊斯兰教并无多大关系的中东恐怖主义,其起源、种类、诉求、发展、趋势,都是伊斯兰世界完全背离时代主题的“一股逆流”<sup>①</sup>。尽管它“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sup>②</sup>。问题在于,恐怖主义的存在并在短期内难以消灭,同样是该思潮对中东境遇的一种客观反映。向恐怖主义说“不”,是包括中东人民在内的全人类共同的责任,但“只要伊斯兰国家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仍处于边缘化的弱势地位、中东问题得不到公正的解决,只要美国继续推行错误的反恐战略,只要中东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依然存在,中东恐怖主义就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激化”<sup>③</sup>。美国推动的全球化给中东带来了多少好处不好评估,但恐怖主义却通过打击美国而率先实现了全球化,真是时代的绝妙讽刺!

尽管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早就成为中东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但还是有一部分伊斯兰的思想家认为在这个不幸的时代,伊斯兰复兴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他们就是以著名的知识分子卡尔达维为首的伊斯兰中间主义的提倡者。他们自称构成的是一个中间主义学派,主张对宗教文本,如《古兰经》和“训奈”以及大量的有关伊斯兰的传统的法律、社会、政治思想进行合理化的解释。但他们的取向并不仅仅是文本,而是以对现代中东广大穆斯林境遇的深度关怀为特征,不仅是关怀他们的宗教和信仰,而且涉及穆斯林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和心理等。此外,他们认为改善中东穆斯林的境遇不仅同伊斯兰观念、精神、生活方式的真正复兴、平等联系在一起,而且与穆斯林是否具备理性的知识、对现代世界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由于中间主义倡导正本清源,致力于社会公正、互信和谐,呼唤保护环境和适度开发,逐渐成为全球化时代最具价值内涵的思想。与其主张相似的“新伊斯兰主义”“后伊斯

① 王铁铮主编《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人民出版社,第8页。

②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③ 王铁铮主编《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人民出版社,第13页。



兰主义”“伊斯兰宪政主义”等思潮纷纷涌现，在强大的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之外汇聚成一股股清新涓流。而作为世界主要文明体系之一的伊斯兰国家，其核心价值观的走向是继续片面强调战斗的“圣战”观，还是转向温和中正的伊斯兰中间主义道路，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3. 第三次转型就是本次以威权政权的集群式倒台和政权更迭为主要表现的剧变，它以建构民主政治改善民生为诉求，毫无疑问是阿拉伯世界一场规模巨大而前所未有的民主革命，即便可能是一场不成功的民主革命

威权统治走向关键点，一些国家的威权政权纷纷被推翻。从世界范围来讲，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化背景下民主化浪潮的继续，也可以说是民主化的“第四波”，对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发展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当前国内外学界、政界围绕中东变局的性质存在多种观点。首先是“民主革命说”，认为中东剧变的性质就是一场“民主革命”或者“阿拉伯之春”，阿拉伯民众“是在为自由、尊严、公正而斗争，是为了用民主取代各自国家的专制制度而斗争”，民众抗议、要求当权者下台，用一个全新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这种抗议就是革命。<sup>①</sup> 北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王锁劳认为，“这是一次以实现‘政体’转变为目的的‘阿拉伯革命’，即从一党专政和一人独裁的政治体制转变为多党选举执政的民主体制”<sup>②</sup>。博联社总裁马晓霖也认为，“这是一场基于民生，而非民主，源自内力，而非外力的阿拉伯民主革命。……即使……宗教势力上台，那也是民主选举的结果。从历史上看，这是第一次颠覆威权政体，也是阿拉伯近百年来一次大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是反帝反殖反封建，推翻外来压力或腐朽卖国的王权。但这次不一样，最大的成就是颠覆了一系列的‘假共和’，总统共和制的国家领导者纷纷下台”<sup>③</sup>。

此外还有“起义和暴动说”，认为阿拉伯抗议浪潮并非革命，更非民主革命，只是形态各异的起义和暴动。<sup>④</sup> “政治危机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

① 哈维尔·巴伦苏埃拉《阿拉伯革命的七个关键问题》，转引自刘中民《关于中东变局的若干基本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2期。

② 王锁劳《有关北非中东剧变的几个问题》，《外交评论》2011年第2期。

③ 陈晓晨《阿拉伯剧变仍处裂变期》，《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12月30日。

④ 阿列克谢·马拉申科《历史缓慢前进》，（俄罗斯《独立报》2010年4月27日，转引自刘中民《关于中东变局的若干基本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2期。

非洲研究所王京烈认为中东变局是波及中东广大地区,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一系列政治危机,表现为民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宗教色彩的冲突与抗议以及示威游行引发武装冲突和外部干预等多种形式。<sup>①</sup>“社会运动说”,姚匡乙大使认为在中东形势动荡中,虽然掺入部落、教派冲突,其间甚至有分裂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主义趁机作乱,但总体而言,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自发的社会变革运动,是长期积累的政治社会矛盾的总爆发。<sup>②</sup>不过,他也认为,阿拉伯动荡“尽管是内生性的政治社会运动”,但由于“推翻强人统治,在广义看,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大进步”。<sup>③</sup>安惠侯大使从四个方面认为阿拉伯变局宜定性为“社会和政治动荡”<sup>④</sup>。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中东剧变是一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它是继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七八十年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之后发生的第三次地区性的政治与社会运动”<sup>⑤</sup>。从总体上看,西方和阿拉伯学界更倾向于“民主革命说”。当中东变局仅局限于突尼斯和埃及时,“民主革命说”及“民族民主革命说”在中国学界引起共识,但随着利比亚战争的爆发以及也门、巴林、叙利亚局势的恶化,多数人认为中东变局的性质尚有待进一步观察。也有专家认为,西亚北非动荡是“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以来该地区最重大的形势变化,是多年来各种内外矛盾积重难返的总爆发,“大乱”是其基本表现形式,总性质尚难定论。<sup>⑥</sup>

笔者认为,这次规模巨大、几乎波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剧变,虽然 22 个阿拉伯国家中,2 个未发生动荡,多数国家发生动荡后很快平息,5 个国家遭到严重冲击,只是占了不到 1/4,而且还出现了民族冲突、宗教斗争、部落矛盾、外力干预、恐怖主义等现象,但从性质上来讲,它终究是一场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革命,尽管可能是一场未成功的民主革命。

首先,要求民主是阿拉伯剧变的基本诉求之一(另外一个主要诉求是

① 王京烈 《解读中东政治危机》,《西亚非洲》2011 年第 6 期。

② 姚匡乙 《中东形势巨变以及中国的中东政策》,转引自刘中民《关于中东变局的若干基本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 年第 2 期。

③ 姚匡乙 《中东剧变与中国中东政策》,《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 年第 4 期。

④ 安惠侯 《阿拉伯国家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前因及后果》,《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 年第 1 期。

⑤ 刘中民 《关于中东变局的若干基本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 年第 2 期。

⑥ 董漫远 《西亚北非变局及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1 年第 5 期。

改善民生)，推翻专制和独裁的威权统治与其说是剧变的表现形式，还不如说就是它的实质内容。埃及和利比亚统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军人政权，穆巴拉克、本·阿里、萨利赫、卡扎菲等长达三四十年的老人政权相继被推翻，在世界民主发展史上，无论如何都是重要的大事件；然而，革命并不到此就戛然而止，随着强人政权被推翻的还有他们长期以来执行的宪法、严格控制公民自由的紧急状态法；另外，实质上的一党专制被多党竞选所替代，甚至公民可以为自身权利做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公决；等等。从上述这些政体变化的角度出发，阿拉伯剧变无论如何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革命。

其次，“革命就是流血牺牲掉脑袋”，话虽简单，道出来的却是真理。从历史的角度看，民主革命常常伴随着民族的、宗教的冲突甚至战争。1640年爆发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是一场典型的民族内战，而且还伴随着克伦威尔对爱尔兰的远征，以及后期三次对荷兰的战争。1789年开始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更是与战争、杀戮相始终，伴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倒退、高潮，又有多少人被送上断头台！英国、俄罗斯则与奥匈帝国联手对大革命进行干预和入侵，欲将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从而把法国的大革命引发为几乎波及欧洲范围的战争。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阿拉伯剧变过程中出现了民族的、宗教的冲突就去否定剧变的革命性质，因为随着旧制度的被推翻，在新制度未建构起来之前，原来在旧制度下掩盖着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必然要暴露和爆发出来，并进而演化为冲突与战争。仔细考察卡扎菲在利比亚的统治，班加西地区和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卡扎菲对东部石油竭泽而渔的剥削方式，以及存在于部落之间的矛盾等其实一直就存在，只不过在卡扎菲的强势统治和打压下，这些问题便“不成其为问题”，一旦卡扎菲倒台，几乎所有矛盾和问题便集中显示出来。

最后，民主革命不一定必须取得成功，并建立起某种被想象的民主体制。革命失败也是一种结局，但这并不就否定革命的性质。回想1848年的欧洲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不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吗？当叙利亚内战进入第四个年头，当埃及的世俗与宗教矛盾上演成为2013年7月根本逆转的局势，军方再度出手镇压穆斯林兄弟会，很多人惊呼“阿拉伯之春”已经演变成为“阿拉伯之秋”或者“阿拉伯之冬”了。且不说“春”“冬”

之间原本存在着的自然逻辑,但就从革命的逻辑来看,这也是一种合乎情理的历史过程。早就有学者指出,所谓威权统治的“转型”,可能会导致三种后果,一种是理想的状态,随着威权主义制度开始解体,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第二种即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的回归,第三种则是以革命的出现来界定的。用所谓的“阿拉伯之冬”来否定“阿拉伯之春”,就像因为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而否定 1917 年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一样,其实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或者是一种“双重标准”,只能蒙蔽真相。

### 三 剧变对地缘政治的外溢性效应

剧变不是也不可能只是阿拉伯共和制国家自己的事情,它对地缘政治与国际局势产生的外溢性效应正在逐渐显现,这种效应反过来也将继续影响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从宏观上来看,以下三个热点问题需要做深入细致的审视:阿拉伯君主制国家何以能够保持相对稳定(政治的继承与换代如何可持续);所谓的“土耳其模式”之于阿拉伯国家,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一个典型的关于伊斯兰与民主关系的政治文化课题);美国又是否能够真正采取超然态度,其中东民主化战略将会做出怎样的调整与变动(有关外部促进民主计划的问题)。

#### 1. 变还是不变:阿拉伯君主国相对稳定及其面临的挑战

阿拉伯剧变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虽然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发生了动荡,但程度却有很大不同。从发生剧变国家的政权类型看,它们均属共和制世俗威权政权。那些阿拉伯君主国虽不同程度地受到民众抗议浪潮的影响,除巴林外,大都平稳过关。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次剧变确切来说是“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剧变”<sup>①</sup>。学术界普遍认为,这场剧变推翻了民主化问题上的“中东例外论”,但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稳定则使“中东例外论”演变为“阿拉伯君主制例外论”(Arab Monarchical Exceptionalism)。众所周知,近代以来,随着世界其他地区君主制特别是绝对君主制的消失,

<sup>①</sup> Sean L. Yom, F. Gregory Gause III, “Resilient Royals: How Arab Monarchies Hang 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23, Number 4, October 2012, p. 74.

阿拉伯世界成为世界君主制国家比例最高的地区<sup>①</sup>，而且这些国家大多仍实行的是绝对君主制。君主制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问题，被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称为“国王的困境”（king's dilemma）。亨廷顿对其前景做出了悲观的预测——“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制都陷入一种根本性的困境。”<sup>②</sup>然而，与世界其他地区君主制的境遇不同，阿拉伯君主制政权不仅长期存续，而且其稳定性高于共和制世俗威权政权。这一有悖世界政治现代化一般规律、挑战政治学主流知识传统的现象，一直困扰着学术界。<sup>③</sup>

我国学者丁隆从传统的政治合法性、地租型经济、以家族和部落为核心的政治联盟、外部力量支持、集权力量的制度性优势以及反对派弱小等六个方面分析了这些国家的政权合法性问题及其保持政权稳定的主要原因<sup>④</sup>。问题在于这些君主国所面临的挑战，包括其陈旧的政治治理方式、单一资源的地租经济模式导致经济和民生问题突出、部分国家族际和教派矛盾突出、美国支持的不确定性等，虽然在阿拉伯剧变浪潮中或安然无恙，或涉险过关，但阿拉伯剧变作为一次民主革命运动，必将唤醒阿拉伯君主制国家民众的民权和民主意识，对其政治前景产生深远影响。而沙特、卡塔尔等国在阿拉伯剧变中采取了“双重标准”，它们一方面积极支持利比亚、叙利亚反对派的“革命”，另一方面压制本国以及巴林的民众抗议，说明其支持民众争取自由、民主是假，而利用阿拉伯剧变浪潮，借利比亚、叙利亚反对派之手推翻与己不睦的利比亚和叙利亚政权是真。这种内外有

① 22个阿拉伯国家中有8个君主制国家，即海湾合作委员会6个成员国，以及约旦和摩洛哥。其中，摩洛哥王国自1660年起便由阿拉维家族统治；约旦哈希姆王国由原汉志酋长侯赛因·阿里的次子阿卜杜拉于1946年建立；沙特阿拉伯王国由原内志酋长阿卜杜·阿齐兹·沙特在统一阿拉伯半岛后于1932年建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海湾地区的原英国保护国陆续宣布独立，建立君主制国家。这8个君主制国家国情千差万别。从人口看，2010年，除摩洛哥（3200万）、沙特（2600万）以外，其他国家人口均较少，人口最少的卡塔尔尚不足100万。从经济看，非产油国摩洛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800美元，约旦为5400美元，海湾产油国则均在2万美元以上，最高的卡塔尔达17.9万美元。参见Rex Brynen (et al.), *Beyond The Arab Spring: Authoritarianism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12, p. 174. 丁隆《阿拉伯君主制政权相对稳定的原因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5期。

② (美)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161页。

③ 丁隆《阿拉伯君主制政权相对稳定的原因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5期。

④ 丁隆《阿拉伯君主制政权相对稳定的原因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5期。

别的政策, 不仅有损王室的公信力和合法性<sup>①</sup>, 也再次使阿拉伯世界的分裂暴露无遗。面对剧变, 君主国究竟变还是不变? 的确是个问题, 如果不变, 鉴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教训, 一旦革命风暴再起, 恐怕王冠掉落一地; 如果变, 传统的体制机制又如沉疴在身, 变革难度之大可以想象, 绝非一日之功。另外, 从全球经济依存度角度看, 用石油美元“购买”合法性和政治稳定只是解决一时之急, 其隐患是长期而重大的。目前, 亚洲占了海湾六国的出口总额的 57%, 六国出口石油的 2/3 都销往亚洲。国际能源署 (IEA) 2012 年预计, 到 2035 年, 90% 的波斯湾出口石油都会销往亚洲国家。因此, 有专家就指出, 一旦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亚洲国家地区整体经济下滑, 很可能引爆第二场阿拉伯之春, 届时波斯湾的君主国都不会幸免<sup>②</sup>。

## 2. 可能还是不可能: 土耳其模式对阿拉伯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 土耳其不仅没有受到波及, 相反一枝独秀, 而且接连打出强劲的外交牌: 与以色列翻脸, 支持巴勒斯坦“入联”, 帮伊朗缓解与美关系, 到埃及、利比亚推销民主……土耳其成了赢得阿拉伯民众好感的“主角”。<sup>③</sup>

应该承认, 近十多年来, 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相比, 土耳其国内政局相对稳定, 经济发展很快, 宗教与世俗之争也逐渐淡化。土耳其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以“伊斯兰和民主之间持久的婚姻”形象, 出现在中东那些独裁政府被推翻了的国家面前。有中东问题专家认为, 中东剧变以来阿拉伯民众呼唤民主和发展, 与 20 世纪 90 年代相比, 土耳其模式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和广阔的市场。政权更替后结束流亡回到国内的埃及宗教长老格尔达威和突尼斯宗教领袖加努什, 都表示在今后的国家发展中要走土耳其之路, 甚至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都做出与伊朗拉开距离、靠近土耳其的姿态。穆巴拉克被推翻后出任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的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指出, “土耳其的经验最接近埃及人民的经历, 我们可以从土耳其模式中获得灵感”。而土耳其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发布

① 丁隆 《阿拉伯君主制政权相对稳定的原因探析》, 《现代国际关系》2013 年 5 期。

② 《中东阿拉伯之春将再引爆?》, BWCHINESE 中文网, <http://www.bwchinese.com/article/1052719.html>, 2015 年 4 月 25 日。

③ 《土耳其想当中东“第一主角”》, 《环球时报》2011 年 9 月 21 日。

的关于土耳其区域形象的报告显示，中东动荡以来，土耳其在中东地区赢得的正面评价日趋稳定化和结构化，它仍是区域国家学习的“模板”。《金融时报》调查表明，即便在黎巴嫩这样一个真主党占绝对优势的国家，93%的民众依然对土耳其怀有好感，迥然不同于90年代中亚国家对土耳其民主的漠然。<sup>①</sup>

如果说以上说法体现出阿拉伯剧变后的“民主市场真空”和对“土耳其模式”的某种迫切“需求”，那么，与此相对照的是，现在的土耳其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更有能力，也更为主动地推广该模式，西方也迫切需要和积极支持该模式。剧变以来，土耳其迅速调整了外交方向，总理埃尔多安对埃及、突尼斯、利比亚进行了访问，致力于销售土耳其民主进步模式，并对叙利亚发出最后警告。西方则充当了土耳其模式的幕后推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指出“中东北非的民众从土耳其模式中获益并付诸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土耳其模式与伊朗模式之争中，土耳其具有比较优势。伊朗模式的诞生出乎西方的预料，受到西方的打压；土耳其模式历史较长，并得到西方的推崇。最根本的区别是伊朗模式是极端、本土、神权性质的；土耳其模式则是仿效西方的，是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长期作用、相互平衡的产物。

我们姑且承认存在着所谓的“土耳其模式”<sup>②</sup>，但它究竟是否适合阿拉伯国家却仍是个谜。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四个因素导致阿拉伯世界不会轻易效仿土耳其模式来改造自己的国家。第一，阿拉伯国家历史上长期遭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直到近代以来才逐渐取得民族独立，到了当代，土耳其又加入北约，与欧洲套近乎，积极为加入欧盟做准备，充当欧洲势力在伊斯兰世界的马前卒，又使阿拉伯国家觉得很反感，因此他们在情感上对所谓的“土耳其模式”不愿接受。“阿拉伯人在线”网站说土耳其是一个“大块头的怪物”“多种混合体”，使人很难对土耳其是什么样的国家做出准确定位。在阿拉伯人的历史中，有400多年是受土耳其人统治的，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至今仍被阿拉伯人“怀恨”在心，一些历史教科书中写道，今天阿拉伯人的落后全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造成的。第二，除了在伊

① 李秉忠《“土耳其模式”刍议》，《欧洲研究》2012年第5期，[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w/qyyj/article\\_2013012475759.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w/qyyj/article_2013012475759.html)。

② 究竟是否存在一种“土耳其模式”，该问题在学术界还有很大争议。

伊斯兰教的政治文化认同方面二者有相似性之外,无论从民族到地域,还是从历史到传统,阿拉伯国家在国情上与所谓的“土耳其模式”都不相符合。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发言人就表示“土耳其的模式无法复制到埃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情况,我们不会跟在其他国家后面亦步亦趋。”<sup>①</sup>第三,阿拉伯共和制威权统治在疾风骤雨的革命风暴中被推翻,伊斯兰政党在乱局中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包括军队在内的世俗力量还是过于强大,在双方的政治博弈中世俗力量对于“土耳其模式”的适用其实是不被允许的——埃及局势在 2013 年的演绎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第四,土耳其对自己这一条世俗化与伊斯兰民主相结合的道路已经探索近百年,而具备某种发展模式的“雏形”严格意义上也不过是在后冷战时代才开始的,如果从正义与发展党 2002 年执政算起,也不过十三四年的时间,作为一种模式还远未定型化,2013 年发生的塔克西姆广场事件说明所谓的“土耳其模式”本身并不成熟。

伊斯坦布尔智库伊达姆主席锡南·于尔根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批评土耳其去年的广场动乱。他指出,埃尔多安强调国家意志的重要性,重申政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是选举及其骄人的政府业绩。但他未考虑“程序合法性”,而这恰好是土耳其近期动荡的根源。就是说,埃尔多安评判民主合法性的标准是物质上的,而程序合法性是基于行为过程本身。程序合法性关注的是法治如何实施,决策过程的透明如何确保,媒体自由如何保护,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民众参与度如何保证。程序合法性也与政治体系容忍和应对异见的的能力存在内在联系。对自由民主政体而言,程序合法性与民主合法性的其他支柱同等重要。它是自由民主政体与非自由民主政体的本质区别所在。土耳其民主的成熟度已经超越这样一种浅薄民主的契约程度。埃尔多安或许仍是土耳其最受欢迎的政客,但他只要仍拒绝完全实施法治、并实现政策制定透明化,他的政府就在一天天丧失合法性。正因如此,仅凭赢得选举已无法平息土耳其的政治动荡了。土耳其政府前进的唯一道路,就是承认其对民主合法性的解读存在关键缺陷,并着手解决这种缺陷。<sup>②</sup>

① 《土耳其想当中东“第一主角”》,《环球时报》2011 年 9 月 21 日。

② 锡南·于尔根《土耳其式“半吊子”民主没有出路》,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5513#s=d>, 2014 年 3 月 28 日。



### 3. 管还是不管：包括民主促进计划在内的美国中东战略的调整及其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有迹象显示西方已经难以自主主导中东。安惠侯大使认为，美国在中东仍居主导地位，但其主导能力减弱。<sup>①</sup> 西方专家也认为，现在中东出现了“四大根本变化使得美国以老方式主导这一地区变得不再现实，甚至不再可取。这四大变化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败笔、大衰退、阿拉伯之春以及美国能源独立的前景”<sup>②</sup>。第一，过去 10 年，美国及其盟国已经认识到，尽管其强大军队能够在中东地区推翻一个它不满意的政权，却非常不善于建设一个新政权。阿富汗和伊拉克仍然处于深层次的不稳定状态，饱受冲突蹂躏。第二，金融危机对中东而言，意味着人们不再可以想当然地认为西方拥有“承受任何负担”的实力。欧洲军事开支正在迅速减少，美国也已开始削减军事预算。奥巴马对于在中东背上新的负担戒心重重。第三，所谓的“阿拉伯剧变”导致穆巴拉克这样的传统盟友倒台，不仅引起了该地区其他长期盟友（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反感和震惊，也使美国认识到，中东人民的命运最终将依靠自己解决。西方对各种政治势力（包括伊斯兰主义以及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宗派主义）感到担忧，但这些势力不可能永远被美国招安或压制。最后，美国的页岩气革命降低了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确实大大夯实了其采取超然态度的底气。

阿拉伯世界的剧烈动荡，对美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从目前来看，挑战大于机遇。<sup>③</sup> 在战略收缩的大背景下，美国的中东政策因“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变局而被迫调整。总体而言，美国对中东政策的调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观望阶段。伴随着“阿拉伯剧变”的蔓延亲美政权领导人纷纷倒台，如：穆巴拉克被迫辞职、本·阿里逃亡海外、萨利赫黯然下野，这种政治变化使美国在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冲击。此外，“阿拉伯剧变”的突然爆发，各国局势的混乱使美国在“阿拉伯之春”初期

①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主编《第四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关系研讨会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第 58 页。

② (英)吉迪恩·拉赫曼《西方主导中东的时代进入尾声》，《金融时报》2013 年 6 月 20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20/c\\_124881466.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20/c_124881466.htm)，2013 年 11 月 13 日。

③ 唐志超《中东变局与阿拉伯世界的未来》，[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60\\_16860.html](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60_16860.html)。

决定实行观望。对于民众街头革命的呼声,美国方面力求在民主与维护地区稳定之间寻找平衡点,追求支持当地政府的稳定状态,并没有全力支持抗议者。

第二阶段:调整阶段。随着局势的发展,美国逐渐对中东局势有了新的认识,“阿拉伯之春”并没有过多地波及美国利益核心部分。因此,开始发挥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中东政策,对中东国家采取了“双重标准”的做法,旨在将中东变局的祸水引向叙利亚、伊朗等国家,煽动这些国家的人民以埃及人民为榜样。而温和的伊斯兰主义政治派别上台之后,美国政府找到了在动荡的局势中可以进行合作的政治实体,试图在新一轮中东政治力量洗牌中发挥重要影响力,捞取地缘政治资本。因此,奥巴马政府开始对中东政策进行根本调整。2011年5月19日,奥巴马发表了对于中东政策的演讲,将支持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运动提升为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表示将采取一切措施来推动这一地区国家的民主转型。总体来看,美国此时的中东战略就是把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结合起来,区别对待各种民主运动。但当情况背离美国利益时,美国政府会采取不同的立场。

第三阶段:修复阶段。经历调整阶段过后,美国对中东政策并没有收到满意的效果,相反逐渐失灵。美国在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利益的几大支柱国家均对美国产生了不满与质疑。沙特方面对于美国军援叙利亚反对派以及是否动武犹豫不定大为不满。而埃及军方也对美国采取刻意疏远态度,以显示出独立性与自主性。以色列则对美国与伊朗的接触表现出谨慎质疑的态度。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奥巴马政府也未能做出持续有效的努力,以色列与哈马斯多次爆发武装冲突。特别是,中东地区民众反美情绪持续上升。2012年9月,影片《穆斯林的无知》在中东地区引起轩然大波,多国民众进行了抗议活动,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被杀。因此,2013年新任国务卿克里上任以来便数次访问中东多国进行斡旋与调解,并修复美国前一阶段中东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与漏洞,力求恢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克里出访中东,标志着美国为有限度重返中东做准备。

第四阶段:有限度重返阶段。修复阶段所要解决的实质性问题仍然存在,如:利比亚宗教、部族纷争激烈,埃及政局平静的外表下暗潮涌动,叙利亚局势仍处于动荡之中,伊朗核问题稍现曙光但问题仍多,以色列与哈马斯武装冲突骤起,而这些问题必须要经过切实的行动方能达成。2013

年中后期，美国面临着叙利亚内战与伊朗核问题依次摊牌的节点，美国的中东政策在这一阶段开始转向释放影响力阶段，进行积极的外交努力。2014年初，逐渐壮大的伊拉克极端宗教武装攻城略地，严重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考验着美国在伊拉克乃至中东地区的政治责任感。这一系列危局，迫使美国不得不将当前主要精力再次聚焦中东，进行有限度的重返。此种重返以美国对伊拉克极端武装发起多轮空袭为标志，而伊拉克坚定拒绝美军地面部队的介入则体现出美国政策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美国中东政策的转变看似幅度较大，实则是根据中东局势的变化而被动的变化。首先，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主旨是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崛起的同时搭上东亚地区的经济高速列车。但在美国国力恢复缓慢的大背景之下，奥巴马政府只能牺牲一部分地区的影响力以分配外交战略资源。因此，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实为中东政策的主线，并没有明确的、切实的、积极的中东政策。然而，中东局势自“阿拉伯之春”后波谲云诡，在没有对中东地区长远战略考量的背景下，美国对中东政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持续变化也在情理之中。其次，虽然在中东地区处于战略收缩态势，但美国并不想放弃全球霸权，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也是美国全球霸权的一部分。因此，美国从本质上讲短时间内不会彻底离开。对一系列重要问题，美国有能力也希望发挥其影响力；对一些涉及美国重大利益的问题，如巴以冲突、伊朗核问题、极端宗教武装等，美国依然处于主导地位。

在当前中东局势依然变化骤现、不甚明朗的大格局下，美国的中东政策表面上依然有功利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因素存在。但在事关美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下，美国对中东国家依然会持续发挥地缘政治的影响力。而对于教派冲突、伊斯兰极端武装等问题，美国政策主要以稳定态势为主，将作用力寄托于事发国家，自己并不会牵扯过多精力。从长远看，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上台，美国主要政治力量依旧会重视国内问题超过国际问题，重视亚太与欧洲问题超过中东问题，在美国核心利益不遭受侵犯的原则下，施行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在中东地区持续战略收缩以保留低限度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奥巴马的目标能否实现，美中东政策能否实现华丽转身，仍值得怀疑。美能否在价值观和安全、利益之间实现平衡，美是否会选择与传统地区盟

友“彻底决裂”，美是否能经受得了中东的“大乱”，地区最忠实的盟友以色列是否会配合奥巴马的中东“新思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大大的问号。

#### 四 用大历史眼光审视中东威权政治的转型

对中东而言，如果说 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是以“9·11”事件为标志而开始的，那么第二个 10 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震惊世界的阿拉伯剧变而开始的。100 多年来，中东从殖民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觉醒到全球化时代走向民主思潮的激荡回旋，一方面为我们展示了各国人民一直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历过类似中东这种痛苦的探寻过程；但另一方面，这种探寻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今天的中东，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究竟何去何从，依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方向。

##### 1. 威权政治转型和民主化的一个基本前提

威权体制下自由化的萌芽与培育程度是威权统治转型和民主化的一个基本前提。尽管中东诸国历史进程和政治环境的差异，使得各国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表现为明显的不同步性。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民主化的关注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在一批阿拉伯国家实行的民主化改革和政治讲话的中心议题中都体现出了这一点。<sup>①</sup>

土耳其 20 世纪 50 年代通过议会选举的形式实现了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更替，首开政治领域民主化转型成功的范例。萨达特上台后的新政举措在政治领域的核心内容即政治生活的自由化，1974 年的“十月文件”和 1976 年多党制的实行，标志着埃及政治民主化的长足进步。约旦在侯赛因国王的主持下，颁布《国民宪章》，规定了约旦的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进程，确定了多党制的政治制度，规范了选举法，多党制议会也对国王控制的内阁形成了明显的制约。进入 90 年代，为了适应国内民众日益高涨的民主呼声，叙利亚在阿萨德政权后期也开始调整国内政策，实行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制度，推行新经济政策，并放松对民众生活的诸多控制，扩大议会的权限，

<sup>①</sup> Howard Handelman and Mark Tessler, *Democracy and its Limits – lessons from Asia, Latin Ame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p. 262.

减少对国内政治反对派的民主活动的监督，巴沙尔在继承其父威权统治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沙特在这期间也实行了政治改革，制定了《基本法》和《地方组织法》，成立了国家协商会议，尽管这只是有限的政治改革，但毕竟是君主制国家在政治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sup>①</sup>

## 2. 威权政治转型和民主化的两条历史道路

威权政治转型和民主化的两条历史道路或者说是两种变革方式即改革或革命。从政治变革的角度看。改革与革命从来就是孪生兄弟，如果不改革，或者不能成功的改革，那么结果往往就是革命。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依存。

从马克思主义革命学的角度分析，如果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而且被统治者也不愿再被照旧统治下去，那么社会革命就会发生。从中东政治演变的现实分析，它直接体现为选举政治与街头政治的关系。相对于街头政治，中东对选举政治并不陌生，然而，选举政治从一开始就具有的欺骗性及其被操纵的特征决定了选举政治与民主的距离还很遥远。阿拉伯剧变终于以街头政治的方式上演了政治变革，可以说是选举政治不彻底的必然结果。阿拉伯剧变还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就是使街头政治成为阿拉伯民众政治所培育出的一种新型政治文化，并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熟知。正如我们在埃及看到的，从穆巴拉克的选举政治到其被街头政治推翻，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大选穆尔西上台执政，再到穆尔西被裹挟着强大民意（街头政治）的军方罢黜。轮回之间，令人焦虑的是这种街头政治何时被约束，而约束的前提是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政治。熟悉新政治文化的强大民意再不可能被“堵”住，而“疏通”不畅，那就只有冲决堤岸一个后果。<sup>②</sup>不仅是中东政治，任何威权政治对此都不可不察。

## 3. 中东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的三个关键问题

研究发展中国家威权政治的转型，有三个关键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即关于民生与民主、国家与社会、军队与政治，中东同样如此，阿拉伯剧变在三个问题方面从实践和理论上提出了若干复杂而敏感的课题，其教训

<sup>①</sup> 参见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sup>②</sup> 参见王泰《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治》，《世界历史》2010年第6期；哈全安、张楚楚《从选举政治到广场政治：埃及穆巴拉克时代的民众政治参与》，《西亚非洲》2013年第3期。

和经验值得总结。

首先是民主与民生的关系问题。剧变以突尼斯青年点火自焚抗议事件为导火索显示出中东民生问题的艰难,引发民众对于民生问题改善,进而要求结束腐败的威权统治的民主诉求。埃及在推翻穆巴拉克统治的 1 月 25 日革命是如此,在推翻穆尔西的二次革命中也是如此。甚至对二次革命来讲,比第一次革命更有意义。正如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系主任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所说“道理很简单,革命往往就是暴动。革命以埃及的衰退而告终,而且会继续衰退下去。什么时候停止衰退,谁都不知道。穆尔西仅仅维持了一年的主要原因是,旧的管理制度坍塌了,而所有主要问题都没能解决。经济效益低下,人们半饥半饱,穆尔西没能让他们吃饱。”<sup>①</sup> 点燃二次革命的埃及年轻人发现,较之穆巴拉克时代,他们就业的困窘并未好转。于是“失业”便与“动荡”相依相存,解放广场几乎成为愤懑无助的青年的一场宏大的血腥派对所在<sup>②</sup>,反对派政党正是在持续恶化的民生上做文章,发动群众推翻穆尔西政权,以便取而代之。总之,正如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所说,伊斯兰主义从来就不是、未来也不可能是解决该地区挑战的应对之道,这里所面临的首先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让妇女戴上面纱并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于解决温饱、开启民智。<sup>③</sup>

其次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处理中央政府和社会的不同单元(阶级、利益集团、民间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sup>④</sup> 而所谓现代社会就是指公民自组织(self-organized)起来满足其共同或公共需求的社会部门,它以公民自组织为核心构成,包括媒体、网络、公民的各种公共交往形式等公共领域,公民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等等<sup>⑤</sup>。从表现形态来讲,社会包括政党、工会、行业协会、各种各样的联合

① 《抗议的金字塔——街头军事政变的五个教训》,(俄罗斯《莫斯科新闻报》2013 年 7 月 15 日。

② 葡妍《“阿拉伯之冬”来了》,《国际先驱导报》2013 年 1 月 15 日。

③ 参考消息网 2011 年 12 月 14 日报道法国《回声报》2011 年 12 月 12 日发表题为《阿拉伯革命一周年》的文章,作者为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

④ 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娄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 104 页。

⑤ 贾西津《什么是公民社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网, <http://www.crcpp.org/cpiphtml/jiaxijin/2007-7/24/200707241715.html>。

会、商会、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妇女组织、青年组织、其他利益集团等社会团体，统称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s）。自从亨廷顿所谓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席卷南美、东欧、黑非洲之后，特别是随着个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公民社会力量的冲击下发生政权转移，人们开始把中东的民主化寄托于公民社会力量的培育和壮大。公民社会 and 政党一样，毫无疑问是推动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埃及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赛义德·艾丁·易卜拉欣特别指出国家—社会关系的非零和博弈特征，强国家并不就意味着弱社会，或者相反；事实上，大多数西方稳定的民主制度都是强社会和强国家；而对于中东国家而言，一般的情况则是弱社会和弱国家。<sup>①</sup>

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重视公民社会的作用是因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在削弱威权主义政府及帮助建立和维持民主政体方面发挥着关键的政治作用，而且在改善民主政体的治理质量方面发挥着关键的政治作用。阿拉伯剧变展示了中东威权体制下社会的发展程度已经到了通过某种方式的大规模动员可以导致政权倒台的现实政治效果。在民主的监督和实现过程中，公民社会正在释放出其巨大的能量。公民社会与民主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民主在最低限度上意味着一整套的统治规则以及通过竞争性组织或者利益集团之间的和平操作而实现的制度化治理，那么公民社会就是此类最标准的组织或集团，除了那种直接民主的模式，公民社会组织被认为是实现大众参与治理的最佳渠道。<sup>②</sup>当然，公民社会和民主化的关系在实际中绝不会是这么简单，更不会在真空状态下操作。这种关系往往受到所谓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影响——例如国家的特殊遗产、集体记忆、个人和集体当前的状况（形式和内容）；此外，地区的和国际的因素也会阻碍或者促进二者之间的关系，使之不可确定<sup>③</sup>。

最后是军队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如何认识军方在威权政治转型中的地位与作用？众所周知，不仅中东共和制的威权政体多是军人政权，即便是传统君主制，也是靠军队维系自己的统治。对于转型而言，正如《威权统

① Saad Eddin Ibrahim, *Egypt Islam and Democracy (Critical Essays)*, p. 246.

② Saad Eddin Ibrahim, *Egypt Islam and Democracy (Critical Essays)*, p. 247.

③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31～107页。

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所指出的那样 “如果转型是从一个军队广泛参与的政体下所启动，而且在转型期间行政领导人仍由军官担任时，冲击会显得比较直接：军方在制度上的利益——还有军官们的个人利益——不得被那些不怀好意的民选领袖所损害。……腐败是问题的一部分，但最大的问题是军队的政治化。”埃及军队曾经在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并不是虚妄之词；反过来，有资料显示，埃及军队参与国家的经济活动达到 25%，也说明其在埃及政治经济社会中的独特地位<sup>①</sup>。穆巴拉克被推翻后，军事委员会建立的临时政府在过渡阶段的种种表现充分体现了威权统治时期军队的利益无所不在。而穆尔西和军人的博弈最终以穆尔西失败，军人重建临时政府而告终，不仅说明它与穆兄会是格格不入的敌对关系，也说明它对于民主的推动面临巨大的挑战。

“让军队能够在一个‘常态的’民主制度中维持地位的必要条件：必须修正对自己是救世主般的定位；必须给予他们一个在追求（而非决定）国家利益过程中不可或缺而且光荣的角色；而且他们也决不能被那些因为无法透过民主程序达到目标而转向军方求援的官僚政客诱惑。”在埃及，这都是短时期解决不了的问题。反对派誓不让步的态度成为军方手中的一颗炸弹。埃及军队继续发挥着国家真正掌权者的传统角色，没有让彰显力量的机会溜走。穆巴拉克的垮台曾让军方颜面扫地，即便穆斯林兄弟会始终对其毕恭毕敬，也无法弥补军方自尊心受到的伤害。“改变军方把自己视为救世主与维护国家最高利益的自我形象是一项更加根本的挑战……这种改变通常会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只有军方有权决定什么是国家利益，还有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被威胁着。因此当军方认为某些无法接受（危险分子或反国家分子）的实力即将上台，某种无法忍受的“无序”或冲突即将来临，还有当某种对军方自身怀有敌意的势力即将上台的时候，军方就会‘被迫’进行干预。可能的干预条件多得数不清——完全根据军方的想象还有他们的官僚意识形态。”消除这些障碍，显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果说，穆尔西至少是为了其作为一个伊斯兰主义者的理想而奋斗，那么一支不为国防存在的军队又是在为什么奋斗呢？

<sup>①</sup> 安惠侯 《阿拉伯国家转型及其走势》，《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 年第 1 期。



#### 4. 威权政治转型与民主化的四个实现维度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判断威权政治的民主化转型是成功的，是否按照西方的民主定义，实现了一人一票的投票表决的权利就是完成了民主化？对于中东特殊的文化民族宗教区域而言，安瓦尔·赛义德教授在分析中世纪伊斯兰的统治模式时指出，“我们必须指出几个问题：首先是与合法性有关的问题，即统治者如何上台的问题；其次是在解决国家事务时的大众参与问题；再次是个具有两面性的问题，即政治义务与责任的问题，它涉及人民服从统治者的义务，以及如果统治者的行为不合法时，人民可以推翻他们的权利”<sup>①</sup>。我们认为，以上三个问题，即政治继承、政治参与、政治责任，如果再加上一个关于政治文化的问题，就可以基本构成中东政治民主化的立体式结构。

首先是政治文化的问题。政治文化从大众心理、民族传统习俗，个人行为观念等多个层面决定威权统治转型及民主化的文化结构是否形成。政治文化就像大海的深层，并不为海面的波涛所影响，而只是一如既往的波澜不惊。改变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并建立民主的政治文化，对于存在长达几千年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中东——地域性政治文化、顺从性政治文化、非参与性政治文化，其难度可想而知。任何倒退甚至复辟，乃至纠缠于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及其组织制度，都将是中东政治发展中最正常不过的历史现象。好在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民主政治的变革一旦开启，随着大众对于权利的诉求普遍增长，选举政治乃至街头政治等政治文化被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所接受、所认可，威权统治也就越来越难以回复到其开始时的统治面貌了。或许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文化结构真的需要做彻底的转换和改革，才能迎合时代的脚步，开启伊斯兰民主的新历程。

其次是政治继承的问题。一个富有韧度而不是脆弱的政治体制，或者一个走上政治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政体，其最重要的标志可以说就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继承与换代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权力的交接至关重要，对内直接影响政治稳定，对外则影响地区稳定与和平。穆巴拉克被推翻之后，过渡的军政府迅速改善与伊朗的关系——仅仅是两艘伊

<sup>①</sup> 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董正华、郑振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99页。

朗军舰通过苏伊士运河——引发外界的诸多猜测，中东几乎所有国家（除了以色列，很大程度还有伊朗）在政治继承与换代方面给外界留下的全是谜。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和中东国家的威权政治比较起来，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西方的政治继承有章可循，任期制得到普遍遵守；中东国家的领导人长期以来则贪权恋栈，纷纷建构和实践的是名为共和，实为“世袭的共和制”政体。血缘性的政治继承——不论是君主制或者共和制——由于新生代的生存环境和面对的时代主题必然与老一辈有着巨大分歧，从而引发不安；而非血缘性的政治继承，如果不是在军人手中代代相传，那么在实质意义上推行选举民主方面，上台的几乎全是伊斯兰主义者，就更增加了政治继承的诸多变数。穆尔西执政一年即被罢黜，即使是所谓的“公民社会政变”，同样是对民主重大的破坏和倒退。革命以反对穆巴拉克连任或者把职权交与其儿子加麦尔为目标，是 1952 年共和革命以来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体现，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叙利亚子承父业的所谓“共和世袭制”政治模式非常难能可贵的自我修正。不论作为“奇里斯玛”式领袖的纳赛尔去职于突发的心脏病而由副总统萨达特接任，或者萨达特总统在纪念十月战争的庆典仪式上被刺杀，由副总统穆巴拉克接掌政权，毕竟还是一种制度化的政权交接。执政了 30 年的穆巴拉克在 2011 年终于先是被“人民起义”逼得无所适从，继而再去任命副总统，最后被迫交权于军方的历史命运，提示中东的统治者寻求一种百姓能够普遍接受的、制度化的权力继承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再次是政治参与的问题。按照发展政治学的观点，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一个国家的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越高，该国的政治发展水平就越高。当然，威权政治体制下的政治参与——则是以压制政治参与为特点的。中东作为历史上专制主义盛行的地区，后来演变为威权主义根深蒂固的地区，如沙特、伊朗、埃及等代表性国家的个案研究所显示的，其政治参与度十分低下，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种低度的政治参与不仅表现在一般性的政治参与，而且与伊斯兰教关于穆斯林妇女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社会地位（受教育的程度与此直接相关）的相关规定紧密相连，致使其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比较其他地区更低。阿拉伯剧变的广场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这一印象。埃及的解放广场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象征——广泛的、大众的、普遍的政治参

与——不仅是埃及的青年，还有大量的妇女，不仅是受他人策动的“动员参与”，一开始更体现为行动者本人自发的“自动参与”（没有明显的组织者，没有专门的政治口号）。

人们终于在“1·25革命”中看到了不同于以前任何时代的埃及。如果说以前埃及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者不过区区几百人，最多也不过几千人的话，那么这次仅积聚在解放广场的民众就达到数万以上，他们来自埃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如果说以前的游行示威之目的主要是要求政府改变政策、实行“良治”，那么这次则是直接要求穆巴拉克政权下台；如果说以前的集会示威只是反对派部分政治精英的“走秀”之作，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那么这次则真正地唤起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革命。

最后是关于政治责任的问题。政治责任，与政治文化、政治继承、政治参与其实紧密相关，或者就对中东的考察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附在其他三项民主化的实现维度之中，因此，现代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政治学对它的探讨较少，是因为在传统而发达的政治发展体系下，政治责任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早在卢梭的时代，他就提出了相关的命题，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独立宣言》就是政治责任的直接体现。直白地说，就是权力的使用者，必须承担其政治责任，最大限度地为人民服务；一旦权力不能被很好地使用，权力使用者就有政治责任引咎辞职，或者，人民也有政治责任使之下台。在中东威权政治体系下，“责任制进程与相关的政治义务问题”长期以来“悬而未决”，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着威权转型和一种民主化的政治文化的形成、更大的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政治继承逐渐实现，那么政治责任问题自然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 5. 探寻政治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五重历史考量

从大历史的角度透视，以下五个问题在根本上决定着中东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即使从社会革命的角度，也必须对其深刻把握，才可能更容易理解中东政治发展的本质。

第一是民族独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近代以降，中东面临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的巨大压力，致使民族独立成为时代的主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发展的主题。从东方国家遭遇的普遍历史经验来看，没有民族的独立当然谈不上发展；问题在于，一俟“民族独立”的任务完成之后，经济

社会发展进步就应该成为最主要的“民族任务”。事实是,中东民族国家体系构建完成之后,他们依然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意识形态的建构和纷争上,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发展问题,直至目前,除了海湾国家的经济由于石油美元的支撑还说得过去,其他国家的经济大多乏善可陈,终于在 21 世纪初演变成一幕民生之困的悲剧,进而引发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其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深刻记取的。

第二是回归宗教还是坚持世俗的问题。对于中东而言,多种多样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不管其如何分野,终究离不开世俗的和宗教的两类。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宗教与世俗,是否二者之间总是矛盾和对立的而且渐行渐远呢?西北大学王铁铮教授在《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一书中给了我们很好的回答“基于中东地区的宗教地域特征,以及不同宗教对各国社会和政治的根深蒂固之影响,中东社会思潮中的政治因素和宗教因素实际上又很难截然分开”,“中东世俗的政治思潮中蕴含着宗教基因,而宗教思潮中又带着强烈的政治诉求。它们在彼此不断的抗衡、碰撞、融合中释放能量,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中东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的演进”。<sup>①</sup>这里虽然说的是思潮,但思潮背后反映的则是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社会意识,因此,我们不能把宗教与世俗的关系简单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而言,宗教与世俗都具有强烈的反西方色彩,也承担着反西化功能,二者关系与其说是矛盾的,倒不如说是一致的。如前所述,它们在时间上是继起的,在内涵上是互补的,只是在涉及国家内部治理时,二者的矛盾才会上升为主要矛盾。

第三是变迁中的心理适应与文化抗拒问题。国际和西方力量干预中东问题的劣根性,以及在与西方交往过程中的弱势心理,使中东的穆斯林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挑战中,产生了巨大的心理不适或者出现异常的文化抗拒现象,这是很正常的。于是,这些掺杂着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威权与民主、宗教与世俗等多种矛盾对抗性基因的“主义”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它们不仅要努力去解释伊斯兰世界,更试图去极力改变伊斯兰世界。例如,上文提到的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核心的复兴主义思潮,倡导中正和谐的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以及以伊斯兰激进主义为面貌特征的恐

<sup>①</sup> 王铁铮主编《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第9页。

怖主义三大思潮，呈现出同一宗教文明内部，在面对精神之惑与发展之困时给出的三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凸显了广大穆斯林心理适应和文化变迁的矛盾性、反复性、不确定性。曾经作为主流的复兴主义思潮在 21 世纪初期已经出现了消退的迹象，而恐怖主义虽仍有市场，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终究会被历史所淘汰；唯独中间主义指出了伊斯兰文明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精神为之大振，不过其效果究竟如何还有待历史的进一步检验。

第四是民族和解与政治包容的问题。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人们对和解的关注远远不如对冲突的关注，为什么？在逻辑上，为了解决和解首先应该了解冲突；但事实上，和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关注冲突，最终是为了能够实现和解。“和解”意味着宽和、宽容，平息纷争、重归于好。作为世界热点的中东——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冲突，同一国家内部各种政治势力、宗教派别、族群的冲突，乃至世俗与宗教的冲突等不一而足。政治变迁过程中，被掩盖被压抑的问题重新暴露出来，使冲突成为常态，而追求和解和包容就成为目标和理想。通过对中东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寻求最大的社会共识才是和解的基础，政治和解只是一个开始，而众多事实证明，政治和解不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因为政治的问题总是会因为政治人物的喜好发生变化，正如埃及军队、世俗派和穆斯林兄弟会三者关系的角力所显示的那样。只要民族和解不能长期有效建立，政治包容也就不可能实现，动荡就会持续。

最后是独立自主与道路自信的问题。从 19 世纪中期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的初步提出，到 20 世纪中期对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艰辛探索，再到 21 世纪初期全球化时代陷入经济迟滞、政治动荡与社会混乱，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地区像中东（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一样经历了太多的迷茫、苦闷和彷徨。正是在贫穷与耻辱交织、失望和怨恨共存的历史进程中，中东的有识之士和普通大众发出了他们寻求民族独立、振兴国家、复兴文化（宗教）、追求民主的强音，汇成了一波又一波起伏激荡的社会革命和运动。国家发展道路至关重要，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问题解决不了，国家发展永远是混乱的。伊斯兰文明曾经的辉煌并不能掩饰近代以来被西方殖民入侵的苦难，长期以来始终没有找到一条独立自主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是中东发展的根本性缺陷。阿拉伯剧变作为继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之后

的第三次起航，我们希望中东人民能够找到这样一条强盛的道路。“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事实证明这同样不能挽救中东充满混乱与动荡的文明迷思。不过，剧变后的中东要比 20 世纪更清楚地显示出，中东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具有悠久文明和历史传统的中东人民，正在自己的国土上走着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在前进的道路上，一定不是平坦的和直线的，但也不会重复别国的模式，而是以自我变革的活力，与时俱进，在交往自觉中创造新的文明。努力寻找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并且坚定道路自信，才是最为重要的，但这需要时间。

他们终究要走向哪儿呢？

## Abstract

### 1. Transition of Arab Upheavals and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iddle East

—Studies and Thoughts to Issues of Arab Upheavals  
from Long-term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Wang Tai*

**Abstract:** Arab upheavals is an outbreak because of long-term accumulations of political , economic , social and other multiple contradictions , and an inevitable reflections of essential shortcomings of the new liberalist model pursued by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under the backdrop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e upheaval is both a reflection of occa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pontaneity in organization , new media , importance of youth and diversity , and long-term ardu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authoritarianism in Middle East countries. Considering the nature of upheaval and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 the upheaval should be regarded as an Arab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addition , it has 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in terms of the spillover effect due to number of problems derived from the upheaval , such as the stability of the Arab monarchic ruling , adaptability of “Turkey Model” to Arab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adjustment of American Middle East strategy. As for the chaotic results from Arab upheavals and their future prospects , people must consider multiple factors of Arab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depth , which includes history , religious , culture and reality; and evaluate such relations as those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 military and politics and people’s livelihood and

democracy as well from the ma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 in order to explore a rational roa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Keywords:** Arab Upheaval; Middle East politics;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democratization

## 2. British Military Bases in Cyprus

*Sun Degang*

**Abstract:** Overseas Military bases are essential tools for the British to deter potential enemies , maintain regional balance , and seek global hegemony. Since the 1950s , due to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its national strength , British government had to close these bases in Iraq , Libya , Egypt , the Persian Gulf , Aden , Yemen and Southeast Asia , but the bases in Cyprus have remained intact. The two bases in Cyprus have witnessed the great vicissitudes of the Cold War , US global war on terrorism , and the Arab Revolution , respectively. On one hand , in terms of political conditions , the British military bases in Cyprus are the crucial beachheads to project British military power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iddle East , and they serve as essential platforms for the British to safeguard their overseas interests , and deter regional threat. On the other hand , in terms of legal conditions , the two bases in Cyprus are the legacies of British colonial rule , which are by nature hard bases , based on a military base agreement concerned.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conditions determine that the British military bases in Cyprus will exist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 albeit they are confronted with challenges of base's politicalization.

**Keywords:** Overseas Military Bases; British Middle East Strategy; Cyprus; Mediterranean region